

中国最早的监狱是随着夏朝的建立而产生,经过商、西周、春秋各时期的发展,形成古代监狱的雏形。近日,衡阳文化学者、资深律师邹鲁军做客国学讲座,漫谈古代监狱历史文化《图圈内外》,探究——

古代监狱的来龙去脉

■文/本报记者 许 珂 图/本报记者 黄 沐

监狱是国家的“物质附属物”，与国家的历史一样久远。监狱文化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，阶级统治者意志的反映占主流。不同阶级社会有着不同的监狱文化，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也推动着监狱文化的不断发展。监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，监狱随罪犯存在，罪犯依法律产生。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产生之后，就有了监狱，只不过那时的监狱叫“牢”，后叫“圜土”，直到“监狱”。

近日，衡阳文化学者、资深律师邹鲁军做客国学讲座，漫谈古代监狱历史文化《图圈内外》，探究古代监狱是怎样“炼”成的？

尧舜禹时期，皋陶制定并完善了各种法律制度

皋陶生来就和别人不一样，他的脸色发青，嘴巴尖尖的有点像鸟嘴。但长大后的他却多才多艺，既能制作农具，又能制作乐器——尤其是一种长鼓，这种长鼓还被命名为“皋鼓”。后来，因为皋陶为人正直、铁面无私，办事又公道、光明正大，就被舜任命为“士师”，也就是部落的司法官，主要管理刑狱。

当上士师后的皋陶，非常善于管理监狱里的诉讼。对各种案件的判罚都有理有据，公正合理，从没有出现冤假错案。

期间，皋陶还对舜帝提出自己的主张。他说：“罚弗其嗣，赏延于世，有过无大，刑故无小，罚疑唯轻，功疑为重”。意思是：一个人犯了罪，不应株连他的后嗣子孙；如果一个人因立功受了赏赐，也应该遗留给他的子孙。对于过失犯罪的人，处断时要从宽；而对待故意犯罪的人，就要严肃处理。对于犯罪事实不清楚的人，要从轻处理；对于有功于国的人，虽然功劳里有一些可疑的地方，但也应该从优赏赐。皋陶执法严谨公正，注重教化，主张以“法治”辅助“德治”，希望最终实现社会上没有犯罪行为的大治局面。

据说，我国的第一部《狱典》就由皋陶制定。传说，他把《狱典》刻在树皮上献给大禹。大禹看后觉得很好，就让皋陶去实施。《狱典》归纳了偷窃、抢劫、奸淫、杀人等多项犯罪的轻重，给予不同的量刑。同时，皋陶所创制的法律，极有逻辑，比如“五典五惇”“五刑五用”“五刑有服、五服三就、五流有度、五度三居”等，且言简意赅，比如“昏、墨、贼、杀”等。

皋陶文化的内容主要是兴“五教”、定“五礼”、创“五刑”、立“九德”、亲“九族”。

兴“五教”即“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”。

定“五礼”，即“吉、凶、宾、军、嘉”。吉礼即祭祀之礼，凶礼乃丧礼，宾礼系部落与部落联盟之间、部落与部落之间以及与联盟之外的友好部落之间的

聘享之礼，军礼为组织氏族、约束大众成军之礼，嘉礼为“饮食、男女”之礼。

创“五刑”，是指皋陶在虞舜时期，将黄帝以来(即父系社会建立以来)的原始刑法做了一次较为系统的修订，并在原来“象刑”的基础上，制订了劓、刖、桡、黥、辟等几种刑罚，创立了“五刑”。“五刑”即“甲兵、斧钺、刀锯、钻竿、鞭扑”，甲兵，即对外来侵犯和内部叛乱的讨伐；斧钺，系军内之刑，属军法；刀锯，系死刑和重肉刑；钻竿，是轻肉刑；鞭扑，是对轻罪所施薄刑。皋陶在习惯法的基础上整合为“五刑”，无疑是一大进步，创我国刑法之始。

立“九德”，九德即宽而栗(秉性宽弘而有原则)、柔而立(性情温良而能立事)、愿而恭(质朴而能尊敬)、乱而敬(有才而能敬事)、扰而毅(谦和而有主见)、直而温(正直而不傲慢)、简而廉(具大略而能务实)、刚而塞(果敢而不鲁莽)、强而义(刚强而不任性逞理)。皋陶制订的“九德”，内涵包括人的秉赋、气质、品德、才干等许多方面，是目前所知的我国历史上最早考察、选拔公职人员的标准。

亲“九族”，九族即部落联盟核心的亲属部落。部落联盟是一个松散组织，联盟的权威没有可靠力量作后盾是维持不下去的，所以亲“九族”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项重要的政治策略。

正是因为皋陶在司法方面的功劳很大，影响也很深远，后人把他尊为“狱神”，专门建庙造像。而在监狱里无论是狱吏还是犯人，都要向皋陶的塑像顶礼膜拜。

中国古代监狱最早出现于夏朝

中国的监狱起源于夏代的丛棘，亦称“棘丛”。棘，植物名，亦称“酸枣树”，多生于山中 and 野外，开绿色小花，叶呈椭圆形，茎上多尖刺，秋后枝干老化，尖刺更加坚硬锐利。为了惩罚战俘和奴隶，奴隶主就到山上砍来山枣树，编成围墙，将囚犯困入荆棘之中，“系用徽墨，（置）于丛棘”。

到了商代，监狱逐渐发展为“牢”。《说文解字》译为“牢，闲养牛马圈也”，也就是为了防止奴隶脱

身，奴隶主将奴隶用绳索捆绑起来，圈于“牢”内，不使脱逃，后又发展为“画地为牢”，意为画地为圈，坐圈为牢。

圜土是夏商周监狱的通称，土筑圆形围墙用以拘押囚犯。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：“（夏帝芬）三十六年作圜土。”帝芬是帝予之子，约在公元前17—20世纪之间。《释名·释官室》解释：“狱又谓之圜土，筑其表墙，其形圆也，”实为土牢。郑玄注：“圜土，狱城也。”

嘉石是古代监狱的另一种模式，方式是戴桎梏坐嘉石加上强制劳役，是耻辱刑与劳役结合的刑罚。《周礼·秋官·大司寇》：“大司寇以嘉石平罢民，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，桎梏而坐于嘉石，役诸司空。”嘉石，即文石，“有文乃称嘉”，也有人解释为石上刻有“嘉言”，即教育人改恶从善的语录。

经过风雨的洗涤、岁月的锤炼、历史的演变，监狱到了汉代逐步“炼”成，也就是说将囚禁罪犯的场所逐渐称之为“狱”，是从汉代开始的。同时，把囚犯细化分类、监狱的设置管理以及对囚犯的惩罚和劳作提到议事日程，也是从汉代开始的。

到了秦朝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狱体系，监狱的最高管理者称廷尉，廷尉是最高司法长官，管监狱只是职责中的一部分，地方上监狱当然归郡守、县令管理。

两汉时期，国家还基本沿用秦制，中央仍设廷尉，为全国最高司法官。廷尉的职责是管理天下刑狱，每年全国新断狱总数最后要汇总到廷尉；州郡疑难案件要报请廷尉判处；廷尉也常派员为地方处理某些重要案件。有时还可以驳正皇帝、三公所提出的判决意见。廷尉根据诏令，可以逮捕、囚禁和审判有罪的诸侯王或大臣。
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监狱管理基本沿袭了汉朝的规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北周开始正式将“徒”刑列为“五刑”之一，由古代的“五刑”（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）变成封建社会的“五刑”（答、杖、徒、流、死）。有学者认为，这一时期是我国

监狱管理由早期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。

唐朝中央设有大理寺狱，京师及州、县均设有监狱。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专门审核天下刑名，凡罪有出入者，依律照驳；事有冤枉者，推情详明，务必判归有罪，不陷无辜。它与刑部、都察院合称三法司，刑部受天下刑名，都察院纠察，大理寺驳正。凡刑部、都察院、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，皆移案牍与囚徒至大理寺复审，按律例复问其款状，情罪服后始呈堂准拟具奏，否则驳令改拟，曰照驳。三拟不当，则纠问官，曰参驳。其与律例严重抵牾者，或调他司再讯，或下九卿会讯，如屡驳不合，则请旨落落。凡未经大理寺评允，诸司均不得具狱发遣，误则纠之。大理寺审理案件，初期置有刑具和牢狱。

明朝在前代唐宋监管制度的基础上，把狱囚待遇进一步制度化，如《大明令·刑令》就规定：“监狱枷杻常须洗涤，席荐（草席）常须铺置；冬设暖匣，夏备凉浆；无家属者给米一升，冬给棉絮一件；夜给灯油，病给医药。”还分别轻重劳役、允许家属入视等制度。但事实上，明朝的监舍破旧，狭小拥挤，劳役秽苦，饮食克减，狱囚生活极为恶劣，他们“备诸痛楚，十不一生”，“往往瘐死”狱中。

到了清朝，从中央到地方的省、府（厅）、州、县各级都有监狱设置。地方行政、狱政不分，长官职责一统，具体掌管监狱事宜的属官，在府一级设司狱司，有司狱一人，掌管司法狱政；在直隶州或州一级设吏目，“掌司奸盗，察狱囚，典簿录”（《清史稿·官职志三》），即负责助理刑名狱事；在县一级有典史一人直辖刑狱、稽检狱囚。各级监狱设狱卒若干人，担任看守、杂役。清朝还有值得一提的清末监狱改良运动，其关键人物沈家本主张采用当时西方最新监狱标准，改造中国监狱，使中国监狱进入世界先进监狱的行列。1909年，清朝开始筹建京师模范监狱，1910年动工兴建；1911年清政府灭亡，民国元年北洋政府接收该监狱并将其修建完工。

陆游其诗其词其文章法整饬谨严，又风格多维多样，或气壮语豪，飘逸奔放；或沉郁顿挫，情调低婉；或自然流畅，清新俊逸……宛如一泓清灵的深泉，涓涓流淌在我们的精神河床上，涵育滋养着后人的爱国情感和家国情怀。

命终点所迸发出的耀眼的爱国火花，也是对自身家国情怀的终极梳理和精辟总结，其后历朝历代凡是读过《示儿》的人，无不为之感奋动容。与陆游同时代的南宋诗人刘克庄曾写下一首绝句：“不及生前见虏亡，放翁易筑愤堂堂。遥知小陆羞时荐，定告王师入洛阳。”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在《诗数》中如是评价：“忠愤之气，落落二十八字间……每读此未尝不为滴泪也。”明末清初文学家贺贻孙在《诗数》中写道：“率意直书，悲壮沉痛，孤忠至性，可泣鬼神。”诚哉斯言，《示儿》一诗既是陆游对膝下子孙的临终嘱托，更是诗人对国家民族九死不悔忠贞精神的缩影。

陆游其诗其词其文章法整饬谨严，又风格多维多样，或气壮语豪，飘逸奔放；或沉郁顿挫，情调低婉；或自然流畅，清新俊逸……宛如一泓清灵的深泉，涓涓流淌在我们的精神河床上，涵育滋养着后人的爱国情感和家国情怀。

（据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）

衡阳历史文化小辞典

人物系列37

刘祖焕：

立志教书 育人为乐

刘祖焕（1771年—1851年），字象勋，号质夫，士林思之，称曰文清先生，衡阳县乌鸢堂（金溪镇福桥村鉴志堂）人。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甲戌）中进士，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年丁丑）补行殿试，钦点即用特授山西省文水县县令。二十三年（1818年己卯）任山右乡试同考官，敕授文林郎，二十五年（1820年庚辰）乞假回乡归养，居乡任教二十年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庚子）他人举荐复补文水县令原缺，四年，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年甲辰），复谢以病归乡，志力于教育。历掌莲湖、西湖、东山、石鼓四书院山长，享寿八十一岁（录自刘氏族谱齿录）。他与彭玉麟之父彭鸣九同学交厚，刘祖焕是清朝衡阳21位文进士之一，卒后同彭玉麟等六人人祀衡阳学宫，是时地方颇有影响的人物。

刘祖焕为官好，为民办实事。时北方津渡因水急船小，最为难行，文水县文峪川河渡口经常为争渡抢时拥挤“辄相杀伤”。他自出千金置办官船顾专人掌管，后之县令取金以去，祖焕再至复设官船管渡，再无发生争斗伤人

之事。文水经县东流，旧有渠道年久失修，渠堤垮塌淤塞，相邻平遥、交城用水困难。为了解决文水、平遥、文城三县百姓争水、用水问题，他请开新渠均水使三县同时受益，惠民息争。在任期间创办书院，培养提拔寒门优秀学子，弘扬教育，倡导弘正民风民俗。

刘祖焕一生最在意的是他立志教书，育人为乐。他两度任外官七年，居乡任莲湖、西湖、东山、石鼓书院山长，主讲三十余年之久。时之四书院久负盛名，为衡湘学人心仪之地，能掌讲席者，只有名儒硕德之士才能使众信服受任，而他迭请任职，讲经释疑，“在官暇辄拟应举文字以市子弟，自束发受经七十余年，所改作无虑数万篇。”可见其自幼勤奋学习，好读书，读好书，教好书，好写作耐烦批改学生文章成了他一生的志向追求，从作文批改细微处抓起，理解文意，践行学养。惠及子孙、学生，影响社会弘扬正气，德誉衡湘功德人志，品范垂教遗泽后世。

（本报记者翟瑜根据市志办提供的资料整理）

国学教育

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之十七

柑橘栽培



宋代画家赵令穰的《橙黄橘绿图》

柑橘类水果（芸香科柑橘属、金柑属和枳属植物及其杂交品种的果实）以其丰富的营养、芳香的气味以及相伴而来的文化价值受到人们普遍重视，目前产区遍布全球，产量为世界水果之最（占水果总产量的五分之一）。

因易于杂交，故柑橘类水果的品种特别多。探究它们的起源中心，有印度、中国和中南半岛等几种推测，但从文献记载看，最早对柑橘类植物进行驯化栽培的地区是中国。

《尚书·禹贡》中提到长江中下游的先民将橘柚作为贡品。先秦的其他古籍，如《山海经》《吕氏春秋》《周礼》《列子》等，对橘、柚、枳等柑橘类果树

的记载颇多。东周时期，柑橘成为楚地的重要经济支柱，著名诗人屈原在《橘颂》中称之为“后皇嘉树”。以上文献记载表明，我国开始人工栽培柑橘的时间不晚于东周。

到唐宋时期，柑橘种植在江浙、四川等地均形成产业，并确立了香橙、橘、柑、柚、橙等栽培品种。果树整枝、病虫害防控以及果实的收获、贮藏等相关技术也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。柑橘在12世纪由阿拉伯人传入西方，后来随着地理大发现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。经过各国园艺工作者的不断选育，产生了上千个品种。目前，巴西是柑橘类水果的最大生产国，中国位居第二。

（据新华网）

成语故事

内省不疚



内省不疚：出自《论语》，是指自我反省，无愧于心。司马牛问孔子说：“如何做一个君子？”孔子说：“成为君子，就要做到不忧愁、不恐惧。”孔子紧接着又说：“做到自我反省、问心无愧，才能做到无忧愁、无恐惧。”（据新华网）

国学人物

一寸赤心在诗中

陆游一生留下大量诗作词作，相当一批抒写和吟咏家国情怀。正如《唐宋诗醇》所言：“其感激悲愤、忠君爱国之诚，一寓于诗，酒酣耳热，跌宕淋漓。至于渔舟樵径，茶碗炉熏，或雨或晴，一草一木，莫不著为歌咏，以寄其意。”

陆游的诗既有李白的雄奇奔放，又有杜甫的沉郁悲凉，意境宏阔，格调高昂，将“位卑未敢忘忧国，事定犹须待阖棺”的家国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忧国忧民的基调统领并深蕴在其诸多诗词作品中。“早岁那知世事艰，中原北望气如山。楼船夜雪瓜洲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。塞上长城空自许，镜中衰鬓已先斑。出师一表真名世，千载谁堪伯仲间。”（《书愤》）这首千古传诵的七律名篇，感情沉实，气韵浑厚，全诗未着一个“愤”字，却不仅书写出愤之情愫，而且点明了愤之源头，表现了诗人矢志不渝的报国之心。清代著名文学家李慈铭在《越缦堂诗

话》评点道：“全首浑成，风格高健，置之老杜集中，直无愧色。”

“僵卧孤村不自哀，尚思为国戍轮台，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。”（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》）这首为中国古典诗歌涂抹厚重一笔的佳作，意境宏阔，意象奇幻，笔力豪健，气势恢宏，表达了作者“一寸赤心惟报国”的高迈志向和抗战雪耻的坚韧气节。以至于我国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早年读罢此诗，遂将陆游引为精神知己。

悲天悯人的诗人陆游，在扰攘的人世间，始终寻找着自我的对应体，坚持把目光投向故国家园，或直抒胸臆或含蓄寄情，有时如同一员军中猛将，纵马疾驰，斩关夺隘：“三更抚枕忽大叫，梦中夺得松亭关”；有时又保持书生本色，草拟战书，作歌报捷：“更呼斗酒作长歌，要遣天山健儿唱”，永不停息地以诗词抒发和铺陈笃诚赤烈、至死不移的家国情怀。

家国情怀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，

既是一种人生使命，也是一种责任担当，更是一种精神支撑。陆游饱读诗书，修齐治平的情怀浸润在灵魂深处，催生出一首首感情炽热、格调轩昂的诗词作品。

陆游晚年创作的大量诗词，将笔触聚向黎民百姓，表达了心系苍生、魂牵黎民的人文情愫。比如“我年近七十，与世长相忘。筋力幸尚勉，扶衰业耕桑。身老老农间，何能避风霜。夜半起饭牛，北斗垂大荒。”（《晚秋农家》）机趣天然，幽淡雅静，低吟浅唱，怡然自得，表达了作者与民众休戚与共、庆吊相通的真挚情谊。对社会底层普通劳动者的状绘，无疑是陆游诗词家国情怀的重要维度，诗人用醇厚平易、清丽明快的诗词作品，拉近了与普通劳动者的情感距离。

“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作为陆游爱国诗中的扛鼎力作和生命绝笔，《示儿》以雄直之体、浑转之气、奇崛之句，引燃了诗人于生